

引文格式: 胡健勇. 农业绿色转型实践壁垒: 缘由透视与实践进路——以安徽省 S 村小农户茶叶生产为例 [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3, 17(6): 46-53. DOI: 10.12371/j.ynau(s).202305057.

农业绿色转型实践壁垒: 缘由透视与实践进路

——以安徽省 S 村小农户茶叶生产为例

胡健勇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 基于安徽省 S 村茶叶绿色转型调查, 从小农户角度将农业绿色转型实践壁垒归纳为经济利润空间逼仄、绿色技术悬浮乡土和肥药使用路径依赖等多样化表现类型。研究发现, 小农户农业绿色转型实践壁垒与经济价值遭遇中间圈层攫取、单一绿色技术与多样防治需求错位、半工半耕演进与种养循环断裂等因素紧密相关。因此, 通过组建生产平台、提升组织合作水平, 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提高技术适配程度, 塑造茶叶品牌、创造产品价值溢出, 哺育人力资本、锻造内生发展能力, 多措并举、协同推进小农户与农业绿色转型实践深度耦合。

关键词: 农业绿色转型壁垒; 小农户; 缘由透视; 实践进路; 茶叶生产

中图分类号: F 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2023)06-0046-08

The Practical Barriers to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on Reasons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aking Tea Production of Small-scale Peasants in S Village of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U Jianyo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ea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S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mall-scale peasants, the practical barriers to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were summarized into diversified performance types, such as narrow economic profit space, suspended rural areas of green technology and dependence on the use path of fertilizer and medicine. It was found that, the practical barriers to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small-scale peasant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value being seized by the middle circle, single green technology and variou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eeds were misaligned, and the evolution of semi-working and semi-farming and the fracture of planting and breeding cycle. Therefore, by setting up production platform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收稿日期: 2023-05-16

修回日期: 2023-06-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生产绿色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创新研究”(21BSH058); 安徽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项目“‘双碳’背景下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绿色低碳转型的动力机制和路径创新研究”(2022AH020006);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社会学学科研究生创新项目“资本下乡背景下协作式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研究”(SZCXSG202111);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社会学学科研究生创新项目“空间重构视角下城市老旧小区变迁及其治理研究”(SZCXSGS202205)。

作者简介: 胡健勇(1997—), 男, 安徽黄山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研究。



degree of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shaping tea brands, creating product value spillover, nurturing human capital and forging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multipl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simultaneously to promote the deep coupling between small-scale peasants and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Keywords: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ition barrier; small-scale peasants; perspective on reasons; practical approach; tea production

一、研究缘起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同时，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农业绿色转型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而如何推进小农户生产绿色转型则成为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户均耕地面积低于 2 hm^2 为小农户，其数量占农户总数90%以上，“大国小农”是我国长期的基本农情、国情^[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绝不能让小农户成为农业绿色发展革命的“旁观者”和“落伍者”^[2]。然而，小农户对绿色生产却显现“弱参与”“低度参与”的境况。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小农户面临何种农业绿色转型壁垒，如何克服转型壁垒，推进小农户与农业绿色转型实践深度耦合。

学界围绕小农户参与农业绿色转型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亦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导向与实践指引。既有研究主要从现实困境、动力机制与优化路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小农户参与农业绿色转型的现实困境研究。王娜娜等根据农药施用案例研究，阐述小农户在生产中倾向于“只治病、不治土”浅层治理，面临严峻的投入品依赖与生态制约困境^[3]。梁栋依据制度性视角表明，农业绿色转型政策表达呈现规模化处理偏好，小农户被排斥在受益圈边缘区段，降低了参与绿色转型主动性^[4]。二是小农户参与农业绿色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耿言虎立足村庄内生与产业衔接实践，表明政府职能转变、政策资源聚拢与乡村精英引领共同诱发小农户参与茶叶绿色种植行为^[5]。莫经梅等认为小农户农业绿色转型依循“认知-意愿-行动”渐进过程，城市群体愿景传达、社会支持与组织赋能驱动小农户绿色转型初始行为与实践动力^[6]。此外，朱俊峰等通过分析农业绿色转型的生成逻辑与动力源泉，阐明绿色技

术嵌入式推广、消费升级迭代吸引小农户投身绿色生产领域^[7]。三是小农户参与农业绿色转型的优化路径研究。沈兴兴提出通过教育宣传、能力培养，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内外结合方式，引导小农户步入绿色发展轨道^[2]。于法稳认为面临日益加深的资源与环境双重挤压，通过构建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生态补偿机制，明晰补偿标准与拓宽补偿内容可以有效降低小农户转型压力、形塑绿色生产行为^[8]。

综上所述，学界从宏观层面解读小农户参与农业绿色转型居多，研究中鲜有述及小农户参与农业绿色转型的案例阐释与缘由探析，已有研究仍有拓展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已有研究集中关注具备一定经济储备、社会资本的规模农户，而对身居乡野的诸多小农户参与农业绿色转型治理难题着墨不多；第二，在绿色发展进程中，既有研究尚缺系统视角呈现小农户绿色防治实践与技术悬浮的动态图景，以及探究农业绿色转型壁垒的深层根源。本文基于农业绿色转型实践议题，以小农户为切入点、安徽省S村为个案，深度剖析小农户参与农业绿色转型的实践壁垒，希冀为后续研究提供部分参考。

二、研究方法田野点介绍

S村地处安徽省南部X县东部丘陵地带，毗邻市区，2019年入选第5批传统古村落名录。全村总人口2276人（2022年），下辖11个村民小组，耕地确权面积 210 hm^2 ，茶园确权面积 40 hm^2 ，形成人均一亩田、茶园三分地的农耕格局。开辟茶园、栽种茶树、炒制鲜叶与售卖毛茶是农户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S村茶叶发展历程历经人民公社化集体经营、分产到户后家庭经营与务工潮来临后个体经营时段演变。茶叶种植经历了满足国家建设需要、承载自强与求富期许和农业兼业收入三维角色展演。笔者于2022年2—

12月3次前往S村进行田野调查,选择了15位小农户作为研究对象(表1),通过无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调查资料。

第一阶段,人民公社化集体经营时期。20世纪50年代,我国建立了人民公社化体制。生产队作为基层组织核算单位,统一安排劳作与成果分配^[9]。该时期,S村遵循“不与粮争地”原则,以开荒种粮为主,茶叶是劳动时间外围经济作物。茶园纳入集体日常管理范畴。猪粪、草木灰等农家肥是茶叶用肥,化肥农药类属稀缺资源,流通管束严格,尚未投入生产。

第二阶段,分产到户后家庭经营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行,农户分得“零碎”“少数”茶地。S村形成以农耕为主、茶叶为辅的家庭生计模式。调查显示,分田到户初期,户均茶园面积为0.013~0.026 hm²。少量茶叶作为唯一可支配、可获及经济资源,实行精细化管护,日常施用牛粪、猪粪、豆饼与草木灰等农肥,辅以少量尿素、碳氨等化肥。农药数量稀少,仅使用敌敌畏、“1605”等有机氯类杀虫性药剂防治病虫害。

第三阶段,务工潮后个体化经营时期。21世纪初期,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逐渐弱化,农民获得了劳动、择业自主权。务

工潮兴起后,S村近半数村民脱离农耕劳动,茶园悉数托付亲友邻里,集团式流向经济发达地域谋求务工收益,人口流失引发劳动力赤字、农业衰退等治理失序难题。一方面,小农户年龄增加,身体机能弱化,依赖肥药增产防治功能,降低劳动强度。另一方面,面对优质不优价市场结构,小农户选择增施肥药达至“抑害增产”功效,通过能源叠加、产量拼比增加单位茶叶经济收入。

三、小农户农业绿色转型实践多维壁垒表现

农业绿色转型背景下,推广绿色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可创造经济增收。然而,小农户依然面临茶叶经济利润空间萎缩,绿色技术悬浮乡土和肥药使用依赖等多维绿色转型桎梏。

(一) 收益壁垒:经济利润空间逼仄

小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要素投入与收益产出环节均有深度测算,高效益生产方式更易付诸实践^[10]。理论上,通过推广绿色技术、提高茶叶品质可以实现经济增收愿景,增添行动者绿色转型动力。实际上,实施绿色生产、生态防治后,因技术疲乏、市场架构等外部因素,小农户并未俘获绿色转型效益。S村茶叶收益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小农户被迫出售鲜叶,二是茶叶作坊通过加工鲜叶外销毛茶^①。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岁	教育水平	茶园面积/hm ²	类别	职业状态
1	CXL	男	53	初中	0	家庭作坊	开运输车
2	CXS	男	70	小学	0.4	家庭作坊	务农、农闲外出打散工
3	XM	女	70	未入学	0.26	散户	务农
4	WS	男	58	小学	0.13	散户	工地务工
5	ZXY	男	60	小学	0.4	家庭作坊	务农、农闲外出打散工
6	YDJ	女	71	小学	0.26	散户	务农
7	YYK	男	62	小学	0.53	家庭作坊	务农、农闲外出打散工
8	YXK	男	71	小学	0.33	家庭作坊	务农、农闲外出打散工
9	YZ	男	72	小学	0.4	家庭作坊	务农、农闲外出打散工
10	YPJ	男	68	小学	0.53	家庭作坊	务农、农闲外出打散工
11	LJ	女	70	未入学	0.23	散户	务农
12	HXL	男	72	小学	0.2	散户	务农
13	WXL	男	50	小学	0.8	家庭作坊	务农、农闲外出打散工
14	WYN	女	61	未入学	0.3	散户	务农、农闲外出打散工
15	CWD	男	72	小学	0.43	家庭作坊	务农、农闲外出打散工

^①村民经过杀青、炒制后的干茶叶,后期还需在精制厂二次加工。

1. 小农户被迫出售鲜叶

农业绿色转型效益创收需辅以经济资本与参与市场分工方能实现。鲜叶加工具有资金投入与技术门槛条件，部分小农户被迫售出鲜叶换取微薄收入。调查显示（表2），春季鲜叶生长周期长、品质高、价格居高。夏、秋季价格次之。随着市场逐渐饱和，消费动力退却，秋后季价格低迷。据测算，四季收入（以300公斤折算）分别为600元、360元、420元和300元。但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攀升，压缩了获利空间。

2. 茶叶作坊加工鲜叶后外销毛茶

具备资本禀赋、技术优势的小农户运营自家茶园同时，也兼收散户鲜叶，希冀通过初级产品加工，提高附加收入。随着市场分工细化，中间主体嵌入，传统“加工户—茶叶站”人情交易被市场业务来往替代，地方交易模式继替反推小生产对接大市场，价格风险波动压缩了小农户生存空间。调查显示（表3），毛茶销价呈下滑趋势，春季价格总体偏高，夏、秋季价位退居其后，秋后季更次之。

3. 小农户需担负煤炭、柴火等加工支出

2022年，X县颁发《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方案》，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木防治工作，禁止农民砍伐松木充当燃柴。因此，小农户被迫购买煤炭代替木柴，燃料使用由自然馈赠转为市场付费，能源使用结构转变诱发加工成本上升，毛茶利润空间进一步萎缩。

经济获益空间逼仄构筑了小农户参与农业绿色转型的收益壁垒。一方面，生产资料与人力资源等投入成本上升，严重挤压绿色转型效益增值空间，降低小农户参与绿色转型信心。另一方面，小农户植根产业链上游，缺乏资本支撑与外

表2 S村2019—2022年鲜叶收购价格汇总表

类别	2019	2020	2021	2022
春茶	2.4	2.0	2.0	2.0
夏茶	1.2	1.0	1.0	1.2
秋茶	1.6	1.4	1.4	1.4
秋后茶 ^②	1.2	1.0	1.0	1.0

^②秋后季茶叶受气候影响剧烈。据调查显示，近四年夏秋季节严重干旱，茶树大面积枯死，秋茶产量减少，秋后季茶叶绝收。

表3 S村2019—2022年毛茶销售价格汇总表

类别	2019	2020	2021	2022
春茶	15.0	13.8	13.8	13.6
夏茶	11.2	10.6	10.6	10.4
秋茶	10.0	10.0	10.0	9.6
秋后茶	9.0	9.0	9.0	9.0

部联结机制，被动承接原料供应任务，难以参与成果划分而成为农业绿色转型的“弃婴”。

（二）技术壁垒：绿色技术悬浮乡土

技术赋能不能够化解“怎样种地”农业难题。然而，现阶段技术传递却衍生乡土社会承接无力困局，并呈现技术传导与农业实践断裂样态。村委会依托政权代理人角色，广泛开展政策执行社会动员，S村茶园形成粘虫板全覆盖、杀虫灯零散分布格局。但短暂应用后，粘虫板等绿色技术陨落乡间。实践证明，目标部位与实际需求错位，现实效果与预期设想相悖，实践成本与效益失衡是绿色技术悬浮乡土三重诱因。

1. 目标部位与实际需求错位

粘虫板是利用昆虫趋黄性，引诱害虫附着板面，以此抑制病虫害。然而，茶树上方多为飞行类昆虫，害虫多附着茶蓬，啃食内部叶片，影响茶叶正常生长。

2. 现实效果与预期设想相互背离

粘虫板等绿色技术被赋予高度信任，并寄望于借助生态防治克服病虫害。但技术疲软、功能障碍等自身缺陷难以实现虫害前端治理目标。

3. 实践成本与绿色效益严重失衡

技术采纳取决于家庭人力资源禀赋与劳动耗费状况^[1]。小农户需额外担负材料收集、成品装配等劳动支出。另外，S村地处气候湿润区域，年降水量达1829mm^[2]，雨水频繁导致板面粘贴性能降低，使用周期缩短，更换成本增加。据测算，一亩茶园需要40张粘虫板，市县财政补贴后0.5元/张，两个月更换一次，年均总支出为1800元/hm²。高昂实施成本与绿色农业节本增收目标失衡。

我国农业农村改革经历了从总体支配到技术

治理的过程^[13]。国家将科学技术与农业改造实践融合,并作为治理工具投射生产领域,通过要素赋能、消解负向环境羁绊,提高绿色转型治理效能。但绿色技术作为国家意志与企业研发合成品,是基于治理视角与行政干预的资源配置,其治理逻辑、市场逻辑与小农户实践逻辑解耦,难以契合易变性场景,引发绿色技术下沉乡土失利困局。

(三) 习惯壁垒: 肥药使用路径依赖

2022年,农业农村部颁发了《到2025年化肥、农药减量化行动方案》,提倡化肥、农药减量化使用^[14]。近年来,使用量呈下降趋势,但总体用量仍居高位,小农户肥药施用甚至出现剂量堆叠、时段缩减等行为^[15]。

1. 化肥能源应用呈现叠加结构

每公顷均复合肥、尿素施用量分别为750 kg、1500 kg,严重超过合理施肥标准^[16]。短期增施化肥能够提升作物产量,但长期密集化投入将导致土壤粒状结构损坏,土块板结程度上升、地力衰退等后果,后续生产更依赖“大水大肥”式能源供给。

2. 茶园位置固定,植株年限长

长期单一种养,缺少作物套种、轮作诱发连作障碍^[17]。病毒栖息、繁衍能力增强,茶叶抵御病虫害侵袭能力减弱。加之,绿色技术效用低下、成本高企,反向助推农药使用依赖。小农户农药施用呈现品种混合、药量堆砌等显著特征(表4)。大剂量、高频率用药应对虫害危机亦造成环境恶化、害虫抗药性增强等生态困境,小农户踏上农药施用的“跑步机”,对农药需求量不断增加^[18]。

投入品使用与产量提升密切关联,但二者并非简单线性关联。研究显示,肥药投入量对产量具有先增后减特征。小农户施肥用药诉诸个体感觉经验,缺乏客观衡量标尺,日常表以肥药最大化特质。实际上,高强度肥药注入将引发实际增长量缩减,并导致环境污染与土地退化等危机。面对资源与环境双重束缚,小农户出于经济理性考量,持续追肥施药提升产值。长期“大水大

肥”式种植习惯造成了严重生态困境,加重了投入品使用路径依赖^[3]。

四、小农户农业绿色转型内卷化缘由透视

农业内卷化是在生产地域锚定图景下,要素持续投入引发边际产值下降的动态过程^[19]。小农户注入资金、时间等资源参与农业绿色转型实践,却造成收益下降,陷入绿色转型内卷化约束瓶颈。深究缘由,小农户绿色转型内卷化源于经济价值高度流失、单一绿色技术与多样需求深度错位和家庭再生产模式转变与传统农业种养循环断裂等多重诱因。

(一) 经济价值遭遇中间圈层攫取

时下,全球农业正遭受“食物帝国”与大型中间商主导的秩序宰制,形成“沙漏状”市场体系^[20](图1)。中间圈层对生产、流通等关键节点加以控制,改变了市场参与主体关系模式。产品交易从传统“多对多”人情模式转向“多对一”整合模式。关系模式转变削弱小农户适应能力,并引发交易权利缺乏保障、经济利润寡薄困境^[21]。

茶苗育苗到鲜叶加工均在村庄内部完成,而毛茶外销则处于利益搏斗领域,中间层级划定价格与行业准则,偏离传统人格化交易与小农户知识专长。一方面,传统小范围接洽互动和约定俗成的毛茶地方交易网络破裂,小农户受社会资本匮乏、组织化程度低等因素限制,游离市场边缘地带,被动接受外部价格传导。另一方面,精制厂为避免交易纠纷,降低交易成本,增强渠道控制能力,而与中间商对接,形成“小农户-中间商-精制厂-出口商”流通闭环。有限交易渠道强化了中间圈层权威。此外,中间商时常采取季节赊销、货款延付等方式,维持自身资金流动安全。总之,市场交易渠道、风险承载能力等先天差异造就资本与小农户权力不均等,利益分配失衡状态^[22]。

(二) 单一绿色技术与多样防治需求错位

技术作为“有用、有效”知识能够激发个体

表4 S村小农户农药使用情况汇总表

种类	草甘膦	乙草胺	吡隆	联苯菊酯	敌敌畏	对打	金精全铲	红钻
防治对象	杂草	杂草	蚧虫	叶跳虫	食叶肉虫	茶尺蠖	卷叶虫	松毛虫
用量	半瓶	半瓶	3瓶盖	2瓶盖	1/3瓶	3瓶盖	2瓶盖	2瓶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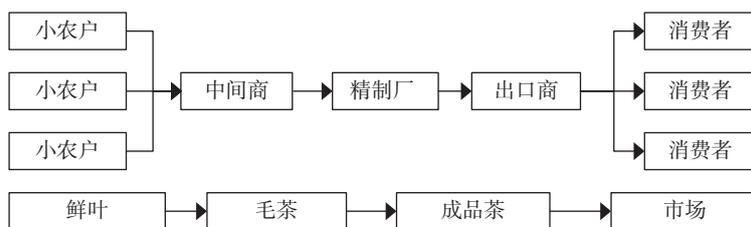


图 1 茶叶生产与流通示意图

或组织行动能力。其赋能农业绿色转型有利于将事后被动应对转为事前主动预防，增强农情响应与应变能力。然而，现阶段技术下乡以单一推介为主，遵循贯彻国家意志与政策目标推广逻辑，忽略了农户主体性与客观环境要求，造成政策传输与实践匹配承接窘态。无主体化、单一化外源性技术嫁接引发农业扭曲性、破坏性发展难题^[23]。政府与专家掌握技术传播主动权，小农户处于“失声”状态，目标防治区域衍化为技术实验场地。病虫害防治绩效仰赖覆盖指标衡量，实际功效位列其次，绿色防治“去效果化”“重数量化”现象显著，人为制造技术触底扎根的天然区隔。

当下，绿色技术供给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政府购买服务过程将资源提供者与服务使用者分离，自身职能转为目标制定、资金拨付与环节监督。农资企业以种类多元、服务高效等优势获得委托代理权限。但其作为通用技术供给派，服务研发以市场为导向、利益为基点，生态环境、实践成效等正外部性环境拷问被搁置设计底层，技术性格与乡土气息匹配程度低。标准化、单一化服务传输无法满足多样化防治需求，技术落地面临承接乏力等机能障碍。S村绿色技术实践证明，工具型惠农政策倡导与简单技术移植在推广中时常遭遇水土不服，“最后一公里”应用困境^[24]。

（三）“半工半耕”演进与“种养循环”断裂

随着工商资本下乡、青年精英返乡浪潮兴起，农民生计与就业活动发生新转变。研究发现，资本下乡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降低城市务工年龄、技能等刚性要求。部分老年劳动力参与雇工劳动获得经济收入，满足了生产与消费平衡。驻地就业虹吸人口向农业外转移，农业兼业化趋势逐渐强化，农耕仅作为满足家庭消费的替代选择。据调查，S村小农户农闲季节在当地蔬果基地从事栽培、除草与采摘等农业劳动，日薪 90 元（按 9 h 计），雇主并提供工作午餐。相

较于茶叶微薄经济效益，承受农资上涨与市场风险链式压力，农业市场化就业更符合小农户货币收入心理追求。

近年来，倚仗肥药节劳稳产效能，压缩务农周期，汲取非农创收现象愈演愈烈^[25]。小农户因人力资本弱化难以消纳高强度劳动负荷，强化了肥药取代积肥、绿色防治等生产习惯。随着农业兼业化趋势增强，昔日庭院农业资源稀缺，排泄物回田通路梗阻，种养循环断裂。因缺乏有机质摄入，“地块不肥”约束性增强，小农户端赖肥药密集化投入，维系效益目标。

五、小农户农业绿色转型的实践进路

面对小农户农业绿色转型约束集合，通过整合农业资源、改善要素投入结构与优化产品品质，能够实现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与品牌增值愿景。具体而言，需要政府与村庄协同施策，依托搭建组织平台、加大研发投入、塑造产品品牌与哺育人力资本，促进小农户与农业绿色转型有机衔接。

（一）组建生产平台，提升组织合作水平

小农户经济实力羸弱，社会资本匮乏，被边缘化在供应链上游，陷入交易信息失能困境。以整合碎片化土地资源与链接分散化生产主体为契机，构建生产平台，纾解小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商谈能力孱弱等困局。首先，依托村委基层政权代理人身份，整合零碎地块，完善道路交通、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实现茶园集中连片种植，降低生产成本支出；其次，发挥自我管理功能，统筹生产全过程，合作社制定茶叶生产公约，统一品种、排灌与作业，推进产前、产中与产后标准化改造；再次，统一公共物品服务渠道，以集体身份购买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提升议价能力，降低购置成本；最后，优化专业服务供给，借助村社组织与农技部门业务交往优势，邀请农技人员定期勘察茶树生长状况，推广病虫害防治

要领,统一发布信息、用药类型与施药节点,提升统防统治效果。

(二) 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适配程度

技术只有被接受,付诸实践,才能发挥预期效用。面对技术与乡土移位困境,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主要供给者,应积极履行社会服务职责,加大绿色技术研发资金投入力度与配套政策扶持。具体言之,第一,政府统一资源配给,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田间地头生产难题对接科研院所、专家学者,提高技术性能与防治实践适配性,破除实验与应用“脱嵌”障碍;第二,创新财政资金拨付形式,建立分级研发机制,专款专用,研发并推广契合地域类型、作物属性的防治技术;第三,完善绿色技术采纳激励机制,实施测土施肥、生物农药等资金补偿,强化小农户技术应用源动力。

(三) 塑造茶叶品牌,创造产品价值溢出

多层次长链市场将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隔绝,产品价值遭遇资本攫取^[26]。而品牌具有独特符号、标识,能够发挥信息集成与传递作用,破解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矛盾。对此,应积极构建茶叶品牌对接市场。一是发挥乡土精英引领作用,寻找退休教师、“五老”人员收集、整理村庄茶叶历史文化,将地域环境与人文技艺有机融合,塑造消费者对特定区位生态禀赋的赞许与人文历史文化的推崇,孕育错位竞争优势;二是优化加工标准,改良加工工艺,标准化加工提升茶叶质量;三是搭建线上销售平台,拓宽茶叶销售渠道,依托返乡青年、大学生村官等人才资源,通过直播带货、农产品展览等走出去战略,增强品牌知名度,创造茶叶价值外溢。

(四) 哺育人力资本,锻造内生发展能力

舒尔茨认为,哺育人力资本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价值源泉,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能够改善农户陈旧知识体系,培养驾驭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能力^[27]。我国脱贫攻坚实践证明,依托教育培训与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认知水平与技能掌握能力,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第一,农技部门应更新绿色技术推广理念,创新技术培训与推广方式,通过田间指导、农家课堂与专家结对帮扶等方式,树立主动学习、积极学习理念,提高培训效率,夯实人力资本基础;第二,政府投入靶向政策帮扶,通过人才与资金传

输,筑牢茶叶发展物质根基,打造村域完整产业链,锻造小农户内生发展能力。

六、结束语

文章通过研究 S 村农业绿色转型微观实践,发现小农户参与农业绿色转型壁垒是经济、技术与习惯的综合结果。实践证明,自上而下简单化、外部化标准传输未及情境预期^[28]。小农户深陷茶叶利润空间逼仄、单一绿色技术与多样实践需求错位和投入品使用依赖现实窠臼中。因此,亟待发挥政府、村庄等多主体协同作用,在生产组织、技术服务与销售网络寻求创新突破。通过标准生产、技术治理、品牌推进与内生发展协同推进小农户与农业绿色转型实践深度耦合。

本研究基于农业绿色转型案例研究,阐述小农户参与转型过程的实践困窘。但也展示出一定的解释限度,环境异变与地域差异造就小农户与绿色转型实践复杂性远非如此。因此,从茶叶生产角度考证小农户与农业绿色转型实践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张文宣. 小农户生产现代化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实[J]. 经济问题, 2020(9): 92. DOI: 10.16011/j.cnki.jjw.2020.09.012.
- [2] 沈兴兴. 小农户步入农业绿色发展轨道的路径初探[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3): 103. DOI: 10.7621/cjarrp.1005-9121.20210313.
- [3] 王娜娜, 付伟. 农业转型过程中小农户的生态困境: 以山东省孟村农户农药施用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96. DOI: 10.19714/j.cnki.1671-7465.2022.0038.
- [4] 梁栋. 行政主导农业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公共治理困境[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5): 1.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1.05.001.
- [5] 耿言虎. 村庄内生型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实践: 以云南省芒田村茶产业发展为例[J]. 学习与探索, 2019(1): 24. DOI: 10.3969/j.issn.1002-462X.2019.01.005.
- [6] 莫经梅, 张社梅. 城市参与驱动小农户生产绿色转型的行为逻辑: 基于成都蒲江箭塔村的经验考察[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11): 77. DOI: 10.13246/j.cnki.iae.20210916.001.
- [7] 朱俊峰, 邓远远. 农业生产绿色转型: 生成逻辑、困境与可行路径[J]. 经济体制改革, 2022(3): 84.

- [8] 于法稳. 中国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生态补偿政策研究 [J]. 生态经济, 2017(3): 14.
- [9] 项继权. 中国农村社区及共同体的转型与重建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3): 2. DOI: 10.3969/j.issn.1000-2456.2009.03.001.
- [10] 桑坤. 制度性作物与弥散性作物: 农业产业发展差异形成的作物特性机制——基于中部一个县域两种农业产业的比较研究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2): 45. DOI: 10.19714/j.cnki.1671-7465.2023.0024.
- [11] 杨志海. 老龄化、社会网络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 来自长江流域六省农户数据的验证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4): 44.
- [12] 黄山市水利局. 2021年黄山市水资源公报 [EB/OL]. (2022-09-13)[2022-10-09]. <https://slj.huangshan.gov.cn/tzgg/9060011.html>.
- [13] 渠敬东, 周飞舟, 应星.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6): 104.
- [14] 农业农村部. 关于印发《到2025年化肥减量行动方案》和《到2025年化学农药减量行动方案》的通知 [EB/OL]. (2022-11-16)[2023-03-12]. http://www.moa.gov.cn/nybg/2022/202212/202301/t20230104_6418252.htm.
- [15] 王常伟, 顾海英. 市场 VS 政府, 什么力量影响了我国菜农农药用量的选择? [J]. 管理世界, 2013(11): 50. DOI: 10.19744/j.cnki.11-1235/f.2013.11.006.
- [16] 孙若梅. 绿色农业生产: 化肥减量与有机肥替代进展评价 [J]. 重庆社会科学, 2019(6): 33. DOI: 10.19631/j.cnki.css.2019.06.003.
- [17] 祖田修. 农学原论 [M]. 张玉林,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100-120.
- [18] CAROLAN M. The Sociolog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J]. Political Quarterly, 2012(3): 251.
- [19] 刘世定, 邱泽奇. “内卷化”概念辨析 [J]. 社会学研究, 2004(5): 96. DOI: 10.19934/j.cnki.shxyj.2004.05.009.
- [20] 拉吉·帕特尔. 粮食战争: 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 [M]. 郭国玺, 程剑峰,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8: 9-11.
- [21] 李峰, 梁波. 地方产业政策介入何以削弱奶农行动能力: 基于L市乳制品产业的观察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1): 149.
- [22] 王星, 周重礼. 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技能重组与小农主体性建构: 基于M村制茶产业变迁的过程分析 [J]. 社会学研究, 2023(2): 115.
- [23] LOWE P, RAY C, WARD N, et 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European experience [M]. 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Food Marketing,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 1998.
- [24] 李琳.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扶贫产业的可持续性: 基于中部成村黄桃产业转型的思考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6): 66. DOI: 10.13240/j.cnki.caujsse.20220818.005.
- [25] 陈阿江, 林蓉. 农业循环的断裂及重建策略 [J]. 学习与探索, 2018(7): 26. DOI: 10.3969/j.issn.1002-462X.2018.07.005.
- [26] 叶敬忠, 贺聪志. 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 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2): 137.
- [27] 西奥多·W·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135-180.
- [28] 詹姆斯·C·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0-12.